

17.62

黄石文史资料



三——五期合订本

3 4 5
82. 83. 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黄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目 录

第三辑

- 忆高寿林先生 湖北省人大付主任 高述曾(1)
关于汉冶萍公司一段历史的回忆 克中(7)
日寇在大冶铁矿暴行 何其全口述(12)
从“普爱”到黄石一医院 谷宁(16)
上海救亡演剧队在利华煤矿 肖家俊(24)
黄石地理纵横谈 罗继业(27)
大冶建县时间考 张先金 唐季英(40)
大冶湖建闸史略 野草(43)
湘北烽火 市政协委员 姚风午(58)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恩施二三事 市政协常委 郑子刚(75)
金牛麻花和金牛千张皮 市政协常委 金南谷(80)
飞云洞 刘法绥(81)
黄石名胜诗词选 刘法绥(89)

第四辑

- 大冶兵暴 程子华(103)
大冶铁矿史[中] 吉广智(113)
大冶史话 众志成(161)
战斗在鄂东南 陈义德 刘文才(205)
黄石市土布行业史略 张松亭(213)
黄石火葬场的由来 市政协常委 程常乐(217)

黄石市最早的一条公路	张承良 熊学如(219)
东方山	陆龙泉(221)
附一：《东方山仙迹实考和咏八景词》	小 路(233)
醉吟窝初考	邓惊洲(237)
中国共产党在大冶县革命活动旧址简介	众志成(240)

第五辑

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黄石	程 泰(244)
二、“黄石市商营汽车联运处”之始末	张承良、熊学如(256)
三、解放前的中国红十字会大冶县分会	张松亭(261)
四、胜阳港的来由及发展史	黄开河(266)
五、李宗仁先生当年当选“副总统”的“关键票”	余传弘(270)
六、抗日战争时期大冶厂矿内迁纪略	邓惊洲(272)
七、大冶铁矿史(下)	吉广智(278)
八、黄石市磁湖	刘法缓(291)
九、大冶县赛妇堤由来与发展	汉 师、陈海珊(297)
十、黄石松花皮蛋	阎诗锦(300)

忆高寿林先生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陶述曾

一、回忆高寿林先生给我的教诲

一九二五年四月，我来到源华煤矿公司实习。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这公司的总矿师高寿林，威信很高。当我头一次随他下井时，我的工作服是紧袖口的。他说：“这不行，袖口要能卷起来才方便，煤只是黑并不脏。”我看到井下巷道里泥泞载途，两侧及巷顶的坑木潮黑粘滑。我虽然穿着长腰胶靴，还是借手提矿灯的微光，选些泥水浅的块块踏步。手不敢接触坑木，顶板上落下的滴水，常钻进领口，感觉到冰凉。采煤工人是不穿衣裳的。我也看不惯。接触到新的事物，使我一切都感到陌生。我们巡视了约有两个小时，考查了几处采掘工作面。高寿林总矿师从浠泥中抠出两块石头，摆在巷道旁边说：“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他自己坐在一块石头上，我只得在另一块坐下，泥水浸透了衣服，他说：“井下生活就是这样，你能怕脏？”自此我也能在步在泥泞的巷道上行走，不那么狼狈了。我们又经过一小段窄狭的巷道，人只能爬着走过，这是为了解决局部通风用的临时巷道。我们在出井的途中，看了矿井的通风系统、运输系统、排水系统及机械设备。这一天下午我随高矿师参观了地面布置及动力车间等地面一切设备，具有煤矿的特点。但其原理我都学过，能理解。高总矿师对我的理解力强表示满意。自此以后，我被他认为作他接班人是适宜的。因为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交通、水利、市政、大型结构工程等都是带有公用事业性质

的，当时在军阀统治下这类投资少，我也发誓不给军阀卖力。我之所以改学煤矿，是想依靠同仁的资助资金，求得出路。在这条道路上，师友之间，遇着高寿林先生。一九二五年夏，我受聘于寅山振业煤矿公司任经理兼工程师。寅山企业虽小，由于经济上得到我的胞叔公迪先生的支持，技术上得到了高寿林先生的信任，因之使事业能够顺利的开展。当煤矿建井工程已经顺利完成时，结果却毁于反革命的战火，功败垂成。但是我并不为寅山煤矿被毁（毁于安徽军阀陈调元的部队）而惋惜，反而我为武汉的光复而欢欣。一九二七年春初，我考上革命政府交通部技佐，愉快地加入韶赣国道测量队。从此我走上了土木工程界的道路，能学以致用。一九三四年，我在开封河南大学任土木系主任。高寿林先生千里迢迢来找我。他说他年纪老了，打算退休，希望我回源华煤矿去接他的班。我说：“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煤矿学得很少。源华是湖北省第一个大煤矿，我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我表示不愿到源华煤矿去。高寿林先生很失望地回去了。

二、高寿林先生经历简介

高寿林，汉阳县人，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青年时代，鉴于清庭腐败无能，国家民族深受帝国主义欺侮。国弱民贫，民不聊生，国家的命运已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地步。这时乃立志以身许国而从戎，考入福建马尾水师学堂。曾在海军宿将萨镇冰统率的兵舰上实习。经常在狂风恶浪的大海里练习帆船的驾驶，在海涛搏斗之中，更加锻炼了坚强的意志。为后来投身于实业界，树立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海校毕业后，派在广甲兵舰上服役。甲午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抗日海战时，北洋海军战败后，广甲兵舰英勇抗击日寇与致远、威武等兵舰同被击沉。

甲午海战失败后，立志于实业救国，放弃了公费派往英国留学机会，转业至江西萍乡煤矿，充当德籍总工程师赖伦的翻译，从而跟随赖伦学得关于煤矿的建设、开采等各种专业技术。辛亥革命以后高寿林先生曾在湖北省营之阳新煤山湾煤矿工作。他对大冶、阳新一带的煤田地质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他认为有十处煤矿可以开采，黄石的桐梓堡系其中之一。当时大冶人士周晋阶创办的富源煤矿公司，所开采的矿区，就在桐梓堡煤田范围之内，而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老式的小煤窑而已。

三、艰苦创业 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办好企业

富源煤矿公司是周晋阶在一九一一年创办的。至一九一七年桐梓堡矿井，井下运道深远涌水量增大，如仍按土法开采已不合算。但是矿区发展前途很大，公司董事会决定改选，陶公迪任经理，增资股本银五万元，并聘请高寿林任总矿师，并由高介绍前萍乡煤矿煤师陈定安任副总矿师。他擅长于采煤专业，矿井采掘布置、矿井灾害的防治、经济核算等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十余年来，他与高总矿师能密切合作，使矿山的业务蒸蒸日上。当高寿林先生受聘富源煤矿公司之初，即着手矿区的勘察，拟订矿区开发的总体规划，改用西法开采。因资金不足，曾遭受种种困难，历经艰辛。高寿林、陈定安正副总矿师运用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十余年如一日勤俭创业的精神，在总经理陶公迪的信任支持下，初期着手于小土窑的改造，采取了边生产边改造的方针，切实做到了由小到大，从土到洋，逐步发展，逐步完善，把一座小土窑改造成为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正规煤矿。

四、精打细算 勤俭办企业

高寿林先生除有丰富的采矿经验外，还有勤俭办企业的

精神，他对待每个单项工程的造价，是精打细算的。例如对井口加固，不用水泥，而用石灰，三合土勾拌细筑，加强凝固力，对水上运输只买钢板，自造轮驳。对于机械设备，凡是能自己做的就不向外厂购买，凡是能中国造的就不买进口货，节约外汇，曾与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合作，凡是能制造的都自己制造，如三百匹马力柴油机，是配合周恒顺厂制造的，在国内当时是首创的产品，其它如矿用绞车、水泵、压风机、局扇等均做到自己制造。高寿林先生常说：“国家象我这样学识的人，车载斗量，但是象我这样勤俭办企业的人，却不多见。”富源（后改称源华）煤矿公司，以有限的资金，在封建势力和买办资本的阻挠威胁下，能够做到扩大再生产，同时，股东还能按时领取股息红利，是行政与技术两者配合无间，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的结果。

五、对待事业 有高度的责任感

高寿林、陈定安正副总矿师非常勤俭，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待日常工作，一丝不苟，每天黎明前起床，用早餐后下井，重点到各掘进及采煤工作面，亲巡一次，作必要的技术指导，在十一时后出井，洗澡、午餐，十三时，开调度会，听取各段负责人的汇报，进行具体指示，确定赏罚，并安排下一日的工作。十五至十七时，亲赴地而各车间及建筑工地，巡查指导，即时解决现场的问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规定的假期，寒暑无间，即使春节也照常上班。高寿林先生常说：“勤能补拙是真理，梅花香从苦寒来。”

六、惨淡经营 使企业稳步前进

源华煤矿自一九一八年改组后以有限的资金，从事小土窑改造的同时，还要顾及基建工程。如开拓桐梓堡背斜的北翼竖井及穿越，背斜两翼的南平峒开拓工程，对待这些庞大

的新建与扩建工程，是一个艰巨课题。在采取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对井巷工程，考虑到开拓工程量少，周期短，采用多水平的开拓方式，切实做到以矿养矿，分期建设，逐步扩大的方针。首先对小土窑的通风、排水、运输等系统进行全面技术改造，安装机械设备，取代了体力劳动。至此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上升，由公司改组初期年产量万余吨，遽增至十万吨以上，迨至一九三〇年，矿井生产能力达十八——二十万吨以上。至此源华煤矿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逐年都有积累的公积金。除股东能按时领取股息及红利外，职工也能得到奖金。历年以来，陆续添置了很多机电设备，更新了原来的蒸汽设备，除了增添矿山的厂房宿舍外，还在汉口购置面积很大的富源里。至此源华煤矿公司的实力特别雄厚了，取得鄂省煤炭企业的领先地位。

七、矿井的灾变

黄荆山煤田的地而露头分布辽阔，因此，历史上废弃的小煤窑甚多。源华煤矿井下，在生产过程中，曾数次遇到穿老窑水的事故，都是发生于小煤窑的积水，穿水后，造成矿井部分或全部停产的灾害，损失极大。在历次穿水事故中，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冬季。当井下发现有穿水的严重迹象时，副总矿师陈定安，即时奔赴现场，即将井下全部采掘工人撤出矿井。（当时高总矿师因赴武汉参加董事年会）由陈副总矿师率领七名技术人员及段长，前往现场查看，未及撤出，水已淹没了出路。由陈定安率领的七名技术人员及段长、探水班组长及探水工人等十八人，全部以身殉职。这次事故，采掘工人基本免于死亡，而主要的技术骨干几乎全中罹难。这次灾变给源华煤矿造成的损失最大，特别是高寿林先生受到重大的打击。他的得力部下，主要助手和他的一

爱子死亡，使他在精神上难以承担。加上年事已高，体力不支，所以毅然提出辞职。接他下手的是王季良。高寿林先生从容地清楚移交完工作后，即退休还家。于一九三六年病逝汉口寓所。高寿林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不沾名钓誉。他顽强的意志，坚苦卓绝的精神，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国家、为群众着想。他一生的业绩，可作为我国科技界工作者的典范而铭志。

关于汉冶萍公司一段历史的回忆

克 中

(一) 汉阳钢铁厂的拆迁

1937年初，由于当时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签订合同，由德国设计和提供设备建设湘潭钢铁厂。资源委员会派遣一批技术人员(三十多人)到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实习。我应聘由英国赴德国参加这项工作。当年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中国步步深入、华北沦陷，国难当前，我和严恩或(在德国领导技术人员实习的总工程师)靳树梁、王之玺四人激于爱国热情，电请资源委员会，要求提前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当即获得批准。1937年11月中，我们回到香港遇见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他说：汉阳钢铁厂正在拆迁，要我们立即赶赴武汉参加这项工作。

拆迁汉阳钢厂是由当时兵工署和资源委员会合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领导的。兵工署长杨继曾任主任委员，张连科任副主任委员。资源委员会仅在技术上加以协助。我们到武汉后，也是作为技术协助人员参加工作的。当时计划将汉阳钢厂的炼铁、炼钢、轧钢主要设备，机修设备以及耐火材料拆运到重庆建厂。参加这项工作的技术员工大部是曾经在汉冶萍工作过的人员，其中较老的工程师有，翁德鸾(轧钢)、金其重(炼铁)、侯德均(采矿)、唐瑞华(机械)等十余人。资源委员会仅有我们从德国回来的四人。

在拆迁汉阳钢厂的同时，还在萍乡煤矿拆迁了发电厂和采矿设备及在大冶铁厂拆迁了鼓风机。由于汉阳钢厂炼铁炉

过于陈旧，另外由兵工署购买了六河沟公司湛家矶 100 吨高炉全套设备。这个高炉的拆迁工作，完全由六河沟公司负责。所有拆迁的机器和材料，均是先用较大轮船拖运到宜昌堆存，然后由小轮船驳运到重庆。

拆迁工作持续了三个多月，南京沦陷以后，日寇逼近九江，敌机开始对汉阳钢厂进行轰炸。其中有两次较大轰炸，破坏性很大。不但炸毁了一些搬迁机器，而且炸死炸伤了一些拆迁工作的人员。后来还追踪向运输船只进行轰炸和扫射。有一个押运的工程师就是在运输途中牺牲了。堆在宜昌待运的机器也遭到轰炸。

从汉阳钢厂拆迁的机器材料共约三万吨左右。其中包括 200 吨高炉一座，30 吨平炉两座，初轧机、中板轧机、钢轨轧机、中型轧机、设备，机修车间设备以及一些耐火材料等。但这些器材在运输途中损失很大。运到重庆估计不到两万吨。

由于在重庆选定的大渡口建厂基地狭小，高低差距一、二十米，必须搬山填沟。又由于綦江铁矿开采困难，南通煤矿含硫又高，以及从矿山到大渡口修建运输铁路工程也十分艰巨等等原因，使得建厂工程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抗战需要，迁建委员会采取了先建小型冶炼设备进行生产。同时将机修厂、发电厂、六河沟公司负责拆迁的 100 吨高炉及中型轧机装修起来。小型炼铁 20 吨高炉由靳树梁工程师负责设计，两座 10 吨平炉由我负责设计。1940 年和 1942 年这两个冶炼设备先后投入生产。100 吨高炉也相继投产。

严恩或、靳树梁、王之玺和我均在总工程师室工作。1940 年上半年，靳树梁由资源委员会调到威远去创办威远

炼铁厂。1942年下半年又调严恩或、王之玺去云南创办云南钢铁厂。1942年5月，又把我调去建设资和钢铁冶炼厂。从此资源委员会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全部离开了。大渡口钢厂也就改为属于兵工署的企业。

(二)大冶钢铁厂的筹建

1944年春我由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考察钢铁工业，在考察期间，资源委员会打算在战后利用汉冶萍公司大冶炼铁厂基地建设年产100万吨钢铁厂。由在美考察员程义法负责与美国麦基公司接洽由该公司代为设计。我和丘玉池二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底我回到了重庆。由于美国应允借给中国五亿美元作为战后兴办钢铁工业尚未落实，资源委员会打算从日本拆迁广烟钢厂或八幡制铁厂设备运到大冶建厂。1946年初，资源委员会派我和从美国考察回来的周茂柏二人赴日本察看设备，以便作出决定。不料我们由重庆飞到上海后，资源委员会接到驻日本的美国麦克阿塞将军来电，要我们不要去日本，等以后安排好再去。我回到南京后，资源委员会就接到当时在汉口的经济部特派员李景潞电报，说他已接管了汉冶萍厂矿，要我去大冶保管设备。我到大冶后，了解到李景潞已派有五、六人在负责保管。另外尚有留下来未走的日本人不少。设备方面，铁山采矿设备尚较完整，末遭严重破坏石灰窑江边有一座下矿机，铁厂内有2000千瓦发电机，一所机修车间，一所职工医院及一些职工住宅。汉冶萍两座500吨高炉，则完全被日本劫走一空。到汉阳一看，更是空空而也。拆迁时留下的厂房及未来得及拆运的设备与器材，全被日本人劫走一空。汉阳钢铁厂变成了一块废墟。

1946年3月成立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由程义法任筹

备处主任，我为副主任。因程义法始终不愿到大冶办公，后来由我接替他的职务。筹备处成立以后，美国麦基公司派了三位专家，由丘玉池陪同来石灰窑调查建厂基地及矿产资源。他们回去以后，麦基公司做了一个初步设计送交资源委员会。但后来由于建厂经费始终没有着落，筹备处只好决定初步利用铁山一点器材建立一个过渡的小型冶炼设备，以便为将来兴建新厂时服务。在原高炉基地上建了一个 50 吨炼铁高炉。同时从重庆资渝钢铁厂拆运来 1000 匹马力蒸汽机，14 寸轧机一套及 1.5 吨转炉一座并着手设计 30 吨平炉。另外向美国购买一座三吨电炉(此炉后转给广州机器炼钢厂)。约在 1946 年下半年，还由日本拆运来 10 米大型车床一部及 1000 匹马力烧油锅炉一座。

在筹备处期间，关于旧汉冶萍股份问题，1947 年湖北省建设厅曾派人到南京资源委员会交涉过。听说当时资源委员会的立场是，盛宣怀家族股份不予考虑，因盛家管理汉冶萍时，向日本借款尚有二千多万元日元未偿还。湖北地区民间商股，待新厂建成以后可以登记发给股票。另外关于汉冶萍与湖北省政府之间历年债捐纠纷问题，筹备处曾在汉阳一个老先生处获得一本资料，复印了十余本存华中钢铁公司档案中。1948 年下半年，资源委员会已把汉冶萍公司档案运到大冶厂保存。

1948 年 6 月间，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结束，正式成立华中钢铁公司。由张松龄任总经理，我和丘玉池任协理。1949 年 5 月石灰窑解放。解放后由大连迁来了一些设备。1950 年初我到北京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主持大冶钢厂设计组。苏联专家到了中国后，认为大冶基地太小，改在武昌青山建新厂(即武钢)。大冶厂改为合金钢厂。从此汉冶萍

的历史宣告终结。

日寇在大冶铁矿的暴行

何其全口述

大冶铁矿矿史办整理

我是汉阳县人，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为了养家糊口，我十岁就跟人学艺，在汉口以给人上鞋谋生。

记得那是一九四一年，有天，我正在街上干活，突然，警察把我抓了起来，搜走了我的“良民证”，（日寇侵华时期老百姓的一种身份证件，没有此证，不但不能通行，还要抓起来问罪）把我连推带搡的拖到警察局，关进一间大屋子里。这里已经关了百把多人，一打听，才知他们都和我一样，也是搜走良民证后抓进来的。并且说，警察局把我们抓起来，得到很多钱，捞了不少油水。显然，我们是被人贩子给卖了。在警察局我们被关了两天，到第三天，鬼子兵持枪荷弹地把我们押送到汉口码头，上船后，也不知走了多少时辰，到了一个叫黄石港的地方，鬼子吆喝着，把我们一百多人赶上了岸。上岸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把我们这些人卖到这贮矿场挑矿石装船。

后来，因为这里用不了这么多挑夫，我和剩下的一部分人，被鬼子用火车从沈家营拖到铁山，弄到尖山装矿推车。从此，开始了我的“苦力”生涯。

当时，刘庚村的农民被日本鬼子赶出了村子，有的房子被烧毁，几栋幸存下来的房子便成被抓来的外地苦力的歇脚地，我们这些汉口苦力就住在这个村子里。这些房子的内屋

都被打通了，摆着通铺，分上下两层，铺板是用竹条子编的。我住的那间小房，满满地挤了六十多人。我们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被子，垫的是烂稻草，盖的是草包，我们是赤手空拳被抓到这儿来的，矿上从没发过任何生活用品。夏天，臭虫、跳蚤满床爬，咬的人无法入睡；冬天，寒风嗖嗖，冻得几个人抱成一团，用各自的体温来取暖打个盹。

每天，天蒙蒙亮、震耳的汽笛就拉响了，苦力头子高声叫喊着，把苦力们统统赶起来，在外面排队，然后，由各处的苦力头子把自己管辖的苦力们带到工地。

在那个年月，凡是苦力，每天上下班都要被搜身，日本人在矿山周围设立了几道岗哨，到处是关卡，炮楼，还有电网。搜身时，日本鬼子对你稍不顺心，你就得挨一顿毒打，有时，鬼子还平白无故地以侮辱苦力开心。

我在尖山采矿场推矿车，矿车是四方型的，两个人一伙，从早干到晚，没一点休息时间，虽说当时我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可每天累得浑车发软，有时连饭都不想吃。

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可吃得却是一人一小钵饭，五个人共一钵菜，菜里见不到一点油星，并且一日三餐都是海带皮，就连逢年过节也吃不上一顿肉。

苦力不但吃得差，身上连衣服也穿不上。被抓来时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天长日久，全破烂了，大家只得用洋灰袋纸、草袋子当衣裹身。

一年到头，苦力们辛辛苦苦地干活，却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品，每天上班发的一双草鞋，还要从苦力们微薄的工资中扣除。说到工资，嗨，苦力们哪见到一分钱。除了交伙食费，日用品费和其他小费外，剩余的全被苦力头子克扣去，我们最多能得到几包廉价的香烟。

可是，日本鬼子和苦力头子们却花天酒地，生活荒淫无耻。他们在酒足饭饱之余，引诱苦力们抹牌赌博，苦力没有钱，他们说可以赊帐，在干活时增加定额，延长劳动时间偿还。他们就是用这种狠毒的手段，榨取苦力们的血汗。

日本人在铁山开矿，那不叫开矿而是抢矿。他们采矿不讲科学，开采方式非常恶劣，根本不把中国人的性命放在眼里。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为了多抢矿石，他们以中国苦力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当时，死于塌方垮排事故的苦力真是不计其数。

每次发生伤亡事故时，强盗们不但不给予抢救，治疗，处理。却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他们的心比豺狼还要狠啊。

那时候就是这样，苦力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早上活着上山，却不知晚上是否能活着回来，只能是干一天算一天，活一日算一日啊。

日本鬼子和苦力头子串通一气，不仅从生产上压榨苦力，生活上剥削苦力，还对苦力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干活慢了挨打，累了稍微歇一会挨打，有时解个渴都要挨打。

有一次，一个苦力给矿车挂钩慢了一点，鬼子呲牙咧嘴地冲上来将这个苦力拳打脚踢，这个矿工顿时昏迷过去。

还有一次，苦力头子让我们几个苦力将几根五、六米长的小钢轨，从尖山脚下扛到山上采场去，每根钢轨都有一两百斤重，别说扛着爬山，就是走平路也不容易。我对苦力头子说：“我们几个人扛不动呀……”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苦力头子就用手中那根比杆面杖还粗的木棒子，劈头盖脑地把我打得在地上乱滚，顿时头上、身上鲜血直流，苦力们都上前来求情，苦力头子才肯罢休。可钢轨还得扛上山，为了不遭